

以窮爲亨——楊萬里的「詩窮」論及詩學精神*

鍾曉峰**

摘要

對宋人而言，「詩」這一文類與「窮」之間的相互關係被賦予更多的關注，尤其自歐陽脩提出「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之論後，宋代詩文大家均加入討論的行列，「詩窮」也逐漸變成一個獨立的詩學用語。以往學界的討論，多聚焦於「詩能窮人」、「窮而後工」的歷史考察與綜合論述，本論文則以楊萬里（1127-1206）作為個案分析的對象。「詩窮」論題發展至楊萬里，他超越「詩能窮人」與「詩能達人」的論述，著重闡發「窮」對於詩人主體與身分所產生的意義，以及「窮」如何轉化成詩人的精神特質與資產，在饑寒生活與政治貶斥的困境中，仍能保持詩歌的創作熱情、堅守儒家的固窮精神。楊萬里不僅發出「不悔得詩窮」的宣示，更將關乎溫飽的「饑寒」，視為詩人檢視自我的第一關。楊萬里一方面強調「詩人」注定與饑寒窮困相伴，一方面又彰顯「樂而不憂」、「窮而不悔」的自由精神。因此，詩人之樂可以敵王公大人之樂，寒餓詩人可與王公大人平起平坐。在其論述中，更透過與政治人物的對比，突顯詩人個體內在超越性的傾向，進而強調真正的詩人是以無悔無懼的精神，傲視權臣貴宦，在窮困潦倒中甘之如飴地創作。以上觀點，都將透過楊萬里詩文中的自我表述及其與周遭詩友的往來作品，加以分析論證。

關鍵詞：楊萬里、詩窮、詩學精神、南宋

* 感謝匿名審查者的指正，謹此致謝。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學界論及南宋士大夫之生命特質與文學精神時，多認同其表現為轉向內在，關注自我道德修養，¹ 與北宋士人以「政治、社會的主體自居」，懷有「高度的責任意識」的形態有著極大的差異。² 此一轉向內在、超越的精神特質之發展，也反映在宋人「詩能窮人」這一詩學命題。伍曉蔓認為，北宋初期尚氣象，詩言富貴是一時風氣，至歐陽脩（1007-1072）提出「非詩之能窮人」之論，始標誌著「富氣格」的發展轉向。而蘇軾（1037-1101）更是重要的轉捩點：

北宋前中期尚富詩學的產生發展，是以寬厚尚文的政治環境為依托的，這一良好的文化生態在北宋後期遭到嚴重破壞。蘇軾及其他貶居詩人如何處窮，如何在因詩而窮的境遇中看待詩歌對人生的意義，就成為關乎宋代詩學走向的至關重要的事情。³

以蘇軾為中心的元祐詩人承受朝廷貶謫、遠斥，還必須因應隨之而來

¹ 劉子健著，趙冬梅譯，《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18。必須指出，劉子健的觀察角度是一整體「文化」，包括文學、經學、史學與哲學的綜合考察。但指出此一發展趨向，對於理解兩宋士大夫精神變遷，仍然極具參考價值。

²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2003年），頁300。這些論點多立基於政治史、文化史的角度，近年來，也有學者從文學歷史的發展，探究宋代士大夫精神的內在轉向，進而追溯至北宋中後期的蘇轍（1039-1112）。朱剛在其論述中進一步指出：「通過對顏子之學的探討，北宋的士大夫越來越把關注的目光集中到內在的精神天地，這一傾向當然延續到南宋。以「顏子學」為思想底蘊，在詩文創作中所表現的精神特質，可稱為「獨立個體的內在超越」。參見朱剛，〈從「先憂後樂」到「簞食瓢飲」——北宋士大夫心態之轉變〉，《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11-229。

³ 伍曉蔓，〈從居富到處窮：北宋尚富詩學淺論〉，收入周裕鐸主編，《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頁460。

的饑寒窮苦，無疑深化了「詩人處窮」的詩學議題之發展。直至南宋高宗朝，環繞著新舊黨爭而動盪起伏的政治生態並未稍減。南宋詩人對政治之窮與生活之窮的生存感受，比起蘇軾那個時代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對詩人處窮、因詩而窮等議題的關注論述，也成為詩學研究中值得深入的面向。

就文獻的尋繹，不難發現，宋人對「詩」這一文類與「窮」之間的相互關係無疑賦予了相當深刻的關注。⁴ 尤其自歐陽脩提出「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⁵ 之論後，「詩窮」一詞便與梅堯臣（1002-1060）的形象緊密聯繫。北宋李琮（?-?）〈和馮允南見寄〉云：「半生才命苦嗟殊，肯更詩窮效聖俞。」⁶ 南宋曾敏行（1118-1175）《獨醒雜誌》則記載蘇軾與歐陽晦夫（?-?）的自嘲之語：「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之詩，可不大笑乎！」⁷ 可知歐陽脩之後，宋人論詩人之窮不再只關注於孟郊（751-814）、賈島

⁴ 與民間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同時作為歲時節俗」的「送窮」不同，文士詩人的獨特表現在於把「窮」與文類特質、自我表述相聯繫。韓愈（768-824）〈送窮文〉中的「文窮」一詞，可視為最早的表现。韓愈對「文窮」的定義是「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在此，「文窮」是指其自身古文創作無法被世人接受欣賞，而導致自己的潦倒窮困。雖然如此，「文窮」並不同於「詩窮」，劉克莊〈一剪梅〉（袁州解印）：「陌上行人怪府公：還是詩窮，還是文窮？」就對「詩窮」與「文窮」加以區別，說明這兩個詞彙的概念是有所不同的。韓愈文參見〔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送窮文〉，《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8，頁571。劉克莊詞，參見〔宋〕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一剪梅〉，《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卷191，頁7462。又，關於民間百姓觀念中的「窮」可參見姜守誠，〈「送窮」考〉，《成大歷史學報》第40號（2011年6月），頁176。

⁵ 〔宋〕歐陽脩著，李逸安點校，〈梅聖俞詩集序〉，《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43，頁612。

⁶ 〔宋〕李琮，〈和馮允南見寄〉，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卷874，頁10171。

⁷ 〔宋〕曾敏行著，朱杰人標校，《獨醒雜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3，頁22。

(779-843)，更傾向以梅堯臣為代表。蘇軾論梅堯臣之窮，當然有自嘲與戲謔之意，然與此同時，北宋詩文中「詩窮」一詞的使用越來越頻繁，討論對象也不再集中於梅堯臣身上。不論是蘇軾的「平生坐詩窮」，⁸ 或是黃庭堅（1045-1105）的「詩窮淨欲四壁立」、⁹ 賀鑄（1052-1125）「慶湖遺老坐詩窮」，¹⁰ 都可看出，「詩窮」逐漸變成一個獨立的詩歌用語，在北宋中期以後有了固定的用法。¹¹ 南宋之後，「詩窮」一詞不僅被使用的更為普遍，「詩」與「窮」的論述也更顯豐富、多義而值得深入探討。¹²

學界對此論題並不陌生，尤其是關於「詩能窮人」、「窮而後工」的討論。錢鍾書（1910-1998）已辨明「詩能窮人」之說的淵源及發展梗概；¹³ 張健則把「詩窮而後工」視為「作者論」，主要「討論作

⁸ [宋]蘇軾，〈叔弼云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常飲〉，[宋]蘇軾撰，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卷34，頁1799。

⁹ [宋]黃庭堅，〈奉和慎思寺丞太康傳舍相逢並寄扶溝程太丞尉氏孫著作二十韻〉，[宋]黃庭堅撰，劉尚榮校點，《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外集補，卷2，頁1590。

¹⁰ [宋]賀鑄，〈寄漢陽趙尉沔〉，《全宋詩》，卷1102，頁12507。

¹¹ 上述詩例，主要還是從「詩窮」一詞的直接使用著眼，但事實上，如蘇軾「二子緣詩老更窮」；陳師道（1053-1101）「孰知詩力解窮人」；賀鑄「詩鳴人必窮」；楊萬里（1127-1206）「老窮只是詩自悟」、「人自窮通詩自詩」；陸游（1125-1210）「愛詩何得但窮人」、「作詩博得一生窮」等這些材料，雖然並未使用「詩窮」一詞，卻與此論題直接相關。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集序、記、書信等作品中，也往往觸及對「詩窮」的討論。以上詩例分別見蘇軾〈與秦太虛、參寥會於松江，而關彥長、徐安中適至，分韻得風字二首〉之二，《蘇軾詩集》，卷18，頁948；陳師道〈次韻別張芸叟〉，[宋]陳師道撰，任淵注，冒廣生補箋，冒懷辛整理，《後山詩注補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5，頁202；賀鑄〈懷寄周元翁十首〉之四，《全宋詩》，卷1105，頁12541；[宋]陸游撰，錢仲聯校注，〈入春念歸尤切有作〉，《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53，頁3125；〈貧甚戲作絕句〉八首之六，卷63，頁3580。

¹² 張健特別指出，「詩窮而後工」這一論題自歐陽脩、蘇軾「大事張揚，遂成一代流風」，兩宋文士詩人多有提出己說。參見張健，〈「詩窮而後工」說之探究〉，《幼獅學誌》第15卷第1期（1978年6月），頁1-55。文中引言見頁20。

¹³ 錢鍾書，《管錘篇》（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頁1489-1494。

者的窮達際遇，對於創作情況及成果的影響關係。」¹⁴ 另如鞏本棟考察歐陽脩提出「詩窮而後工」之說的歷史脈絡，認為這是北宋黨爭的產物。¹⁵ 吳承學則指出：「對於『詩人薄命』、『詩能窮人』、『窮而後工』之說的選擇反映出中國古人基於詩學觀念與價值判斷之上的集體認同。」¹⁶ 吳氏所謂的「集體認同」，是「多數人的共識」，「引導讀者對歷史事實進行選擇性考察」，其過程「包含了對歷史事實進行虛構和改造」。¹⁷ 因此，文中的「集體認同」並不是指個別詩人對歷史上特定詩人群體的認同，而是指由集體所形塑成型的價值觀念。相對於上述學者著重歷史考察與綜合討論，李妮庭〈陳師道的詩人意識與「詩窮」表述〉一文，是將「詩窮」論題顯題化的代表。文中認為，陳師道（1053-1101）雖然沒有像蘇軾、黃庭堅那樣，直接在作品中出現「詩窮」一詞，但陳師道卻透過詩文表述與具體行動，成為北宋詩人中面對「詩窮」的典範，這種生命選擇，影響江西詩派後學以「詩人身分」實現個人存在價值。¹⁸ 可以看出，北宋的「詩窮」研究，已累積了一定的基礎，而該論題在南宋的發展，則是本文關注的核心。

本文的分析對象，是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楊萬里。楊萬里，為南宋中期最重要的詩人之一。除了四千多首的詩歌創作之外，另有數量頗豐的古文、思想著作。雖然集文學、政事、學者於一身，楊萬里仍以詩人著稱於當時。陸游在〈謝王子林判院惠詩編〉即云：「文章有定

¹⁴ 張健，〈陸游的文學理論研究〉，《文學批評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頁91。

¹⁵ 鞏本棟，〈「詩窮而後工」的歷史考察〉，《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31期（2007年7月），頁121-144。

¹⁶ 吳承學，〈詩人的宿命——中國古代對於詩與詩人的集體認同〉，《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06。

¹⁷ 吳承學，〈詩人的宿命——中國古代對於詩與詩人的集體認同〉，頁102-103。

¹⁸ 李妮庭，〈陳師道的詩人意識與「詩窮」表述〉，《東華漢學》第11期（2010年6月），頁211。

價，議論有至公，我不如誠齋，此評天下同」，¹⁹ 自謙自己的詩不如楊萬里。然而，作為在詩壇有崇高地位的詩人，宋人是如何描述他的形象呢？羅大經（1196-1242）《鶴林玉露》：「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²⁰ 徐璣（1162-1214）〈見楊誠齋〉：「名高身又貴，自住小村深。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葛天民（?-?）〈寄楊誠齋〉：「但知拼得忍飢七十年，脊梁如鐵心如石」；趙蕃（1143-1229）〈次韻楊廷秀太和萬安道中所寄七首〉之二：「愛竹知人憶故山，食貧過午尚懸簞。」²¹ 這些時代稍晚的詩人，都描繪出一個過著窮困生活，但道德節操高尚的楊萬里。

楊萬里窮困貧苦的形象，在南宋並非孤例，當時士大夫與官員普遍過著這樣的生活。²² 與楊萬里同時的陸游，即表述自我：「貧悴還如筮仕初」、「納祿貧如筮仕初」、「謝事貧過筮仕初」。²³ 可見，終其一生，無論是出仕納祿，還是謝事躬耕，陸游都未曾擺脫貧窮。從北宋中期的烏臺詩案、崇寧黨禁，到南宋的慶元黨禁，楊萬里及其同時代的詩人耳聞目睹無數的文士、詩人遭逢罷黜、貶謫的命運。如果貧困窮寒是普遍的，該如何處窮？如何在「詩能窮人」與「窮而後工」的命題下解釋「詩人」的現實遭遇？在困窮之中又要如何彰顯詩人的

¹⁹ 〔宋〕陸游，〈謝王子林判院惠詩編〉，《劍南詩稿校注》，卷 53，頁 3119。

²⁰ 〔宋〕羅大經撰，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4，頁 63。

²¹ 以上詩例分別見〔宋〕徐璣，〈見楊誠齋〉，《永嘉四靈詩集·二薇亭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卷上，頁 111；〔宋〕葛天民，〈寄楊誠齋〉，《全宋詩》，卷 2725，頁 32063；〔宋〕趙蕃，〈次韻楊廷秀太和萬安道中所寄七首〉，《全宋詩》，卷 2637，頁 30830。

²² 梁庚堯，〈南宋的貧士與貧宦〉，《臺大歷史學報》第 16 期（1991 年 8 月），頁 91-137。文中詳述南宋士人的貧窮現象，並歸納導致貧窮的因素為生活態度與經濟壓力。這兩個因素無疑比較偏向現實生活層面，是否可完全概括宋代詩人的貧窮現象，仍有待進一步考察。

²³ 以上詩例分別見陸游，〈冬夜讀書示子聿〉八首之一，《劍南詩稿校注》，卷 42，頁 2629；〈初春書懷〉七首之六，《劍南詩稿校注》，卷 56，頁 3279；〈開歲愈貧戲詠〉，《劍南詩稿校注》，卷 74，頁 4093。

存在價值與意義，對於南宋詩人而言，尤其是像楊萬里這種高壽又高產量的詩人而言，必然是切身而無法迴避的命題。從現存文獻看來，〈次霜月韻〉、〈觀化〉等詩，以及〈陳晞顏詩集序〉、〈答廬陵黃宰〉、〈雪巢小集後序〉、〈歐陽伯威脞辭集序〉等文，皆可見到楊萬里對於「詩窮」、「詩能窮人」等議題的反思與關注，有其研究與闡釋的詩學價值。²⁴ 張健早已指出楊萬里對歐陽脩的「詩窮而後工說」，不僅提出正面理論，也擴大論述的範圍。²⁵ 然而，後續的楊萬里研究中，專文深入考察者並不多見。而本文即嘗試對楊萬里的「詩窮」論述及詩學精神、價值加以探討。

本文論題「以窮為亨」一詞，出自《誠齋易傳》之「否卦」，初六卦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楊萬里釋為：「曰貞吉亨者，以退為吉於進，以窮為亨於亨也。君子以退為吉，以窮為亨，而天下懼矣。」²⁶ 可知楊萬里視否為泰，以窮為亨的思想。「窮」一詞的指涉，則可分成窮達之「窮」與窮富之「窮」，前者主要指政治上的挫敗、貶謫等，後者指經濟生活上的困頓與貧苦，但兩者常相為表裏。舉凡楊萬里詩、文所提及的「貧」、「饑寒」、「詩禍」、貶謫等，本文均以「窮」統論之。本文認為，楊萬里「以窮為亨」之說不只是哲學思維，更具體地落實於其詩學精神及生命實踐，深具價值。以下，首先考察楊萬里對「詩窮」論的反思與自我表述；進而從楊萬里的交往詩文，闡述其以「窮」為詩人精神特質的觀點；最後，呈現楊萬里無懼詩窮，彰顯以詩抵抗詩禍的詩學精神。

²⁴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曾敏行在《獨醒雜誌》，記載蘇軾與歐陽晦夫對梅堯臣「詩窮」的討論，曾敏行是廬陵人，與楊萬里是同鄉，此書的序也是楊萬里所撰。而楊萬里詩集中，有三例直接使用「詩窮」一詞。

²⁵ 張健，〈楊萬里的文學理論研究〉，《文學批評論集》，頁 148-151。

²⁶ 〔宋〕楊萬里，《誠齋易傳》，《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卷 4，頁 37。

二、「詩窮」論的反思與自我表述

如前所述，北宋對詩人與「窮」的關係已有深切的關注，楊萬里在〈陳晞顏詩集序〉一文也闡述了他對當時主流論述的反思：

詩家者流嘗曰：「詩能窮人。」或曰：「詩亦能達人。」或曰：「窮達不足計，顧吾樂於此，則為之爾。」且夫疚於窮者其詩折，愆於達者其詩銜。折者不充，銜則不幽，是故非詩矣。至俟夫樂而後有詩，則不樂之後，未樂之初，遂無詩耶？²⁷

文中舉出了三類關於詩人與窮達際遇關係的（「詩窮」）論述。首先，「詩能窮人」之說，於唐人詩文已然可見，不論是韓愈以「維卒不施，以昌其詩」評孟郊，還是白居易（772-846）以「人間要好詩，天意君須會」評李白（701-762）、杜甫（712-770），雖然出發點不一，卻一致認同詩人因創作好詩而窮，可視為「詩能窮人」之說的代表。²⁸「詩能達人」之說，則以陳師道〈王平甫集序〉及葛勝仲（1072-1114）〈陳去非詩集序〉為代表。陳師道一方面以「人窮而後工」之說認同歐陽脩的「非詩能窮人」之論，同時又以「詩之窮人，又可信矣」申論「貴、富不可得兼」之理；另一方面，又從「傳」的角度，提出「詩能達人」的新說。「詩能達人」一論，並非否定詩人多窮的現實，而是強調立言不朽，以詩傳於後世，才是真正的「達」。²⁹南宋初年的葛勝仲，也提出「詩能達人」之說。他以陳與義（1090-1138）的遭遇為例，說明其晚年仕途的平遂通達，主要得力於詩歌成就。葛勝仲所謂的

²⁷ 〔宋〕楊萬里撰，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78，頁3198。

²⁸ 參見錢鍾書，《管錐編》，頁1490-1491。

²⁹ 〔宋〕陳師道，〈王平甫文集後序〉，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卷2666，頁320。

「達」，則指政治上的發達，與陳師道強調傳世不朽的「達」，雖然不同，但均指向詩歌帶給詩人在聲名、仕途上的幫助。至於第三類，顯然是引用蘇軾〈答陳師仲主簿書〉中的觀點。元豐四年（1081），貶謫黃州的蘇軾在書信中對陳師仲（?-?）說：

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為之益力。其詩日已工，其窮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為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謬，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也。³⁰

文中明言，「詩能窮人」自古以來即獲得詩人文士的認同，這個說法對於今日的自己尤其適合。早在烏臺詩案之前，蘇軾已多次使用「詩人例窮」一語，嘉祐七年（1062），任鳳翔簽判時作詩云：「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何當暴雪霜，庶以躡郊、賀。」³¹ 熙寧四年（1071）通判杭州，往陳州拜訪蘇轍之時，作詩云：「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³² 這些言論，正是呼應「詩能窮人」之說。歷經烏臺詩案，蘇軾成為「詩能窮人」之說的當事人，對此說的體驗與反思也更深入一層。一方面，他不諱言自己被詩所窮，同時也讚許陳師仲能不顧「詩能窮人」的說法，在詩歌上不斷精進用心。蘇軾雖然認同作詩將導致人的窮困，這是針對自己的親身遭遇而言。但他同時也認為，作詩是否讓人窮困這個問題，就如《莊子·逍遙遊》中的不龜手之藥，端看使用者存乎一心的運用之妙。顯然，蘇軾並未纏繞在因詩而窮達的論

³⁰ [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答陳師仲主簿書〉，《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49，頁1429。

³¹ [宋]蘇軾，〈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號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蘇軾詩集》，卷4，頁159。

³² [宋]蘇軾，〈次韻張安道讀杜詩〉，《蘇軾詩集》，卷6，頁266。

題上，「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為之」才是他真正的內心話。人生苦短，適意則為之，是窮是達又何須掛心呢？在此，「意所樂則為之」的創作態度與生命哲學，既使蘇軾超脫「詩能窮人」的魔咒與成說，對「窮」的無懼與承擔，更體現出他自在與從容的生命姿態。

列出三類主流論述後，楊萬里認為不論是執著於「詩能窮人」之說，還是深信「詩能達人」之說，都將帶來創作上的不良影響。對於自己的貧窮感到憂苦、自慚的詩人，其作品就不會充實而有光輝；沾沾自喜於顯達的詩人，他的作品就會誇示。有所欠缺就無法充實完善，自我誇耀就無法深遂，這兩類都不是真正的詩。從「疚於窮者其詩折，慙於達者其詩銜」一語看來，楊萬里不滿詩家拘泥於「詩能窮人」、「詩能達人」之說，囿於一隅必然導致創作的失敗。既然執著於窮、達，都無法寫出真正的好詩，即所謂「非詩」。那麼蘇軾提出的「窮達不足計，顧吾樂於此」就是楊萬里心目中理想的論述嗎？從文中質疑的語氣看來，顯然也無法讓他感到滿意。楊萬里的疑問是：假設「意所樂」而為詩，那麼一旦創作主體缺乏「樂」的條件，亦即「不樂之後」，還是「未樂之初」是否就無法寫詩了呢？顯然，楊萬里不願陳晞顏（?-?）受到主流論述的制約，輕易地將這些論述複製在詩人自我的認知上，從而拘囿了創作主體恆定乃至於活潑的詩思與詩情。在此，有趣的是，楊萬里並未如前述葛勝仲在現存的主流論述中，擇一立場加以發揮己見，進一步地深化既有的詩學觀。相反地，楊萬里注意到，創作者若缺乏靈活的心眼，拘泥於此詩學命題，無疑是畫地自限。（這也不禁令人懷疑，陳晞顏詩集所收錄的詩篇，是否深受既有觀點的影響，而缺乏新鮮的表述呢？）總而言之，詩人論述發展至楊萬里，已是企圖擺脫強而有力的論述，希望陳晞顏從「反省」既有詩窮論述中，跳脫框架，發掘自身的特點與活力，此誠為楊萬里作為詩家最精彩之處。

理解了楊萬里對成說透脫、不拘執的觀念後，我們再進一步地就

楊萬里詩作，探討他是如何處理傳統詩人認知自我「詩窮」際遇的這一類型題材。如同錢鍾書所云，楊萬里的興趣在於自然，³³ 其相關表述，便多來自於置身於自然風景的自我觀照，〈次霜月韻〉詩云：

銀浦寒無浪，金星澹不芒。初看霜是月，并愛月和霜。
萬里除纖翳，雙清作一光。詩窮只欠許，窮我未渠央。³⁴

秋夜寒空，霜月一色，銀、寒、澹、清更營造出明澈、清淨乃至於清寒的氛圍。置身於此清冷、無纖塵的月光底下，楊萬里內心不禁湧現出一個念頭，這不正是為詩所窮的詩人得以相遇的景致嗎？而深深地感到此一命運將無止盡地延續吧！此詩作於乾道初年在吉水居憂時，這也是楊萬里詩中明確使用「詩窮」一詞的首例，體現出與窮相伴之命運的詩人自覺。相近時期，在〈和九叔知縣昨遊長句〉³⁵ 又以「詩窮不但兩鬢霜，白髮緣愁千丈長」來表述自身。最值得注意的是〈觀化〉一詩：

道是東風巧，西風未減東。菊黃霜換紫，樹碧露揉紅。
須把乖張眼，偷窺造化工。只愁失天巧，不悔得詩窮。³⁶

詩中說西風暗換景物之巧妙，與春風相比，毫不遜色，菊花與碧樹皆在潛移默化中改換了顏色。而在此景色遞嬗之際，楊萬里表明，他關注的是如何以敏銳的詩人之眼捕捉上天化育萬物的工巧，即便因此付出窮厄的代價也坦然無悔。³⁷ 在此，可見楊萬里以詩人自任，無懼詩窮的一種態度。而不只是無懼，在〈蘭溪解舟〉四首之二云：

³³ 錢鍾書，《宋詩選註》（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頁219。

³⁴ 〔宋〕楊萬里，〈次霜月韻〉，《楊萬里集箋校》，卷3，頁156。

³⁵ 〔宋〕楊萬里，〈和九叔知縣昨遊長句〉，《楊萬里集箋校》，卷4，頁256。

³⁶ 〔宋〕楊萬里，〈觀化〉，《楊萬里集箋校》，卷33，頁1709。

³⁷ 歷來談論造物與詩人關係，有認為因為窮盡造化之功而招來厄運的想法。在此，楊萬里顯然所指的是一種價值選擇而非因果關係。

日開五色暖征裘，雪滿羣山爽病眸。道是詩人窮到骨，暖邊爽裏放蘭舟。³⁸

詩中楊萬里並未對「窮到骨」發牢騷，反而在群山滿雪的佳景及自然賦予暖意的友善中，體現出一種精神的舒暢與賞玩態度。事實上，「窮」之於楊萬里，並非可怕可懼，相反地，更多的表述顯示，楊萬里心目中真正的詩人是從困窮中淬煉出來的：

魯公尚有粥為食，盧老今無僧作鄰。文字借令真可煮，吾曹從古不應貧。詩腸幸自無煙火，句眼何愁著點塵？俗子豈知貧亦好，未須容易向渠陳。³⁹

詩中自嘲坐擁書城，文字滿眼，卻饑腸轆轤，可見窮是「吾曹」——從事「文字」者無法逃避的命運。然而生計的窮困並不意味精神的貧乏，詩腸無煙火，句眼未著塵，在在顯示了詩人主體精神的超塵脫俗及文字的清新不俗。詩末，楊萬里更是明白宣稱：「俗子豈知貧亦好」，換言之，貧窮對生命的正向助益是凡俗之輩所無法窺知、涉及的精神領域。這裡，相當重要的是，北宋中後期的詩人已多能表述自身對貧窮的坦然接納與承擔，楊萬里則進一步地指出，貧窮正是得以令詩人不同於流俗，在精神主體與實質創作上超脫塵俗的關鍵所在。另如：「學文先要學忍饑，明年看子刺天飛」、⁴⁰「先生喫茶不喫肉，先生飲泉不飲酒。饑寒祇忍七十年，萬歲千秋名不朽」、⁴¹「讀盡詩書不要官，饑寒欲死豈無田。生憎俗子慵開眼，逢著詩人便絕絃」、⁴²不論是鼓勵教導年輕學者，或是題寫敬仰的唐代前賢，楊萬里都突顯忍饑寒是

³⁸ [宋] 楊萬里，〈蘭溪解舟〉，《楊萬里集箋校》，卷 19，頁 946。

³⁹ [宋] 楊萬里，〈次乞米韻〉，《楊萬里集箋校》，卷 3，頁 158。

⁴⁰ [宋] 楊萬里，〈庚戌正月送羅季周游學禾川〉，《楊萬里集箋校》，卷 5，頁 308。

⁴¹ [宋] 楊萬里，〈題陸子泉上祠堂〉，《楊萬里集箋校》，卷 29，頁 1494。

⁴² [宋] 楊萬里，〈題吳江三高堂·陸魯望〉，《楊萬里集箋校》，卷 29，頁 1487。

成就學問人品、詩歌創作的條件。對陸龜蒙的讚美，則顯示出楊萬里所認可的理想詩人典型：即使在饑寒之中面臨死亡的威脅，仍保持對流俗的輕蔑、對權勢的超然，這也是「窮」的真正價值。

進而言之，作為一個詩人，不僅注定要忍饑寒，通過這層考驗，才能真正在詩壇上立足，〈答賦永豐宰黃巖老投贈五言古句〉即闡明此意：

吾友蕭東夫，今日陳後山。道肥詩彌瘦，世忙渠自閑。不見踰星終，每思即淒然。鄰邑黃永豐，與渠中表間。黃語似蕭語，已透最上關。道黃不是蕭，蕭乃墮我前。佳句鬼所泣，盛名天甚慳。詩人只言點，犯之取饑寒。端能不懼者，放君據詩壇。⁴³

首先稱讚蕭德藻（?-?）乃今日之陳師道，在汲汲營營的世俗中獨立不凡。進而指出與蕭有中表關係的黃巖老（?-?），其詩已臻進境，包括足以泣鬼神的詩句，以及造物不輕易給予的詩歌盛名，黃巖老都已達到，猶如蕭詩。而之所以有此成就，來自於其不懼饑寒的精神，而能在詩壇取得一席之地。在此，楊萬里把「取饑寒」，視為詩人能夠自成一家，揚名不朽的條件。

楊萬里以貧為好的觀點，另見於〈答徐居厚史君寺簿〉一文：

貧自是吾徒之邨殿，陋巷一簞，未肯易方丈與數百也，亦要未至餓不能出戶耳。「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長哦此詩，使人三歎也。未見，願言珍重，即對宣室之問。豈終窮者，我則異於是。⁴⁴

這段文字彰顯陶淵明（約 369-427）的固窮之志，並藉此展現自己堅

⁴³ [宋]楊萬里，〈答賦永豐宰黃巖老投贈五言古句〉，《楊萬里集箋校》，卷 36，頁 1853。

⁴⁴ [宋]楊萬里，〈答徐居厚史君寺簿〉，《楊萬里集箋校》，卷 67，頁 2859。

忍的道德自信。「邴殿」一詞，出自《晏子春秋》，是子尾（?-534 B.C.）用來賞賜晏子（?-500 B.C.）的居室，但晏子卻婉拒了。晏子的回答是：「不受邴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⁴⁵ 認為一旦接受邴殿的賞賜，就會膨脹自己的欲望，接著就會帶來像慶氏一樣的滅亡。因此，顏淵（521-481 B.C.）的簞食瓢飲，居陋巷不改其樂的道德修養，就成為楊萬里「貧自是吾徒之邴殿」的理論根源。顏淵的處窮之樂、陶淵明的固窮之志，使楊萬里能以超然的心態面對窮困生活，並且自信的宣稱自己有別於終窮者。這種自信的背後，有「道」作為價值根據。把顏淵不改其樂、陶淵明固窮之志並舉，闡述自己的處窮，在〈答彭侍郎〉一文中再次強調：「曲肱飲水，其樂也天。所謂『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者耶？」⁴⁶ 把陶淵明的固窮之志與儒家的貧居之樂相互統合，清楚揭示出自己對固窮志節的嚮往。

楊萬里這種有意地將「窮」轉化成詩人修養論的看法，實際上，來自於其對「窮士」的規範。甚至，對於處窮不變，在困窮之中堅守道德之士的讚許，其實也是楊萬里對自我的期許，他如此自述：「安於貧而勇於道，此某之所願學者也。」⁴⁷、「某性足以取孤，學足以取窮，漠然為世之棄，固也。」⁴⁷ 因此，安貧勇道就不僅僅是一種生活態度，更是一種道德修養工夫：

某作性僻違，絕不喜與富貴者遊。非敢有傲也，避彼之傲耳。
故著破褐，煮野蔬，而讀書之聲滿天地，則吾之貧賤，未始不
富貴；而彼之富貴，未始不貧賤也，故得以自負。⁴⁸

⁴⁵ [周] 晏子著，陳澧譯注，《晏子春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305。

⁴⁶ [宋] 楊萬里，〈答彭侍郎〉，《楊萬里集箋校》，卷109，頁4153。

⁴⁷ [宋] 楊萬里，〈答歐陽清卿秀才書〉，《楊萬里集箋校》，卷64，頁2753。

⁴⁸ [宋] 楊萬里，〈答學者書〉，《楊萬里集箋校》，卷64，頁2754。

不與富貴者遊，並非出於孤傲，而是鄙夷富貴者的淺薄之傲。楊萬里認為，真正的富貴在於弊衣簞食中不忘讀書求學，這也是他自負有得的所在。這位後學者家境富裕，並無貧困饑寒的體驗，因此楊萬里在第二封書信中強調自己的真實體驗：「足下家富而力裕，何病乎饑寒？所病者正在乎不饑不寒耳。若饑寒二字，天不輕以與人，有以與之，必有以當之也。某半生了無所得，止得此二字耳。」⁴⁹ 認為有心學道的人不應該擔心「饑寒」，反而應該擔心沒有「饑寒」的淬煉。如果天讓一個人承受「饑寒」，是期待他有所承擔。這種視「饑寒二字」為上天砥礪窮士，成就道德主體自我的看法，固然來自於楊萬里兼具理學家的身分，即視「饑寒」為砥礪個人進德修業、充實內在的正向條件。但楊萬里最獨特之處卻在於，將其與詩人本質論與修養論相聯繫，從而將「窮」轉化成深具時代特色與人格力量的詩學精神。

三、「窮」：作為詩人的抉擇

楊萬里曾自述：「予游居寢食，非詩無所與歸。」⁵⁰ 又云：「予生百無所好，而顧獨尤好文詞如好好色也。至於好詩，又好文詞中之尤者也。」⁵¹ 楊萬里不僅本身嗜詩，也對後輩詩人不遺餘力地獎勵，在〈答萬安趙宰〉中坦言：「此心冷於波水，淡於秋也。獨於文士詩人一簡半札，吾目合而不可使之覲，吾手縮而不可使之攝，吾口噤而不可使之讀也。」⁵² 自述晚年退居鄉里之後，生活冷淡，唯獨對於來求文論詩的「文士詩人」一見如故。因此，本節擬從楊萬里與這些詩人文士的交往中，探究其「詩窮」的論述。

⁴⁹ 〔宋〕楊萬里，〈再答學者書〉，《楊萬里集箋校》，卷 64，頁 2757。

⁵⁰ 〔宋〕楊萬里，〈誠齋朝天集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80，頁 3266。

⁵¹ 〔宋〕楊萬里，〈唐李推官披沙集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81，頁 3289。

⁵² 〔宋〕楊萬里，〈答萬安趙宰〉，《楊萬里集箋校》，卷 67，頁 2835。

楊萬里對於「詩人」有其特定的看法，在〈答張功父寺丞書〉云：「古之詩人文士，所挾異於人，則所趨固異於人也。至於其所施於某者，則可大駭者矣。」⁵³ 認為詩人文士非一般常人，有其獨特的稟賦，若能使其專注發揮，將會產生驚人的效用。因此，楊萬里特別重視詩人之內在質性：

詩非文比也，必詩人為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則窳矣。而或者挾其深博之學，雄雋之文，於是櫟括其偉辭以為詩，五七其句讀，而平上其音節，夫豈非詩哉？⁵⁴

文中先強調詩的獨特屬性，再引出詩「必詩人為之」的論點，突顯詩人身分的不可取代性。不論是櫟括偉辭，或者在句讀、音節上用力，楊萬里認為這些都不是真正的詩。詩應該由具備詩人這種身分的人創作，才能創作真正的詩。那麼，「詩人」該有什麼特質呢？〈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

大抵夷則遜，險則競，此文人之奇也，亦文人之病也，而詩人此病為尤焉。惟其病之尤，固其奇之尤……而詩人至於犯風雪，忘饑渴，竭一生之心思，以與古人爭險以出奇，則亦可憐矣。⁵⁵

與文人相比，詩人更致力追求文字語言的新穎奇巧，這是詩人的弊病也是特性所在。為了與古人較一勝負，以出奇制勝，詩人可以不懼寒冷風雪，忘記身體的饑餓，這又是詩人更強烈的特點。可以看出，在楊萬里看來，詩人所挾者，所憑藉者，就是忍受窮困寒冷的生活。而陳晞顏就是具有此種特質的詩人，其盡和陳與義詩，是「劬於詩而紓

⁵³ [宋]楊萬里，〈答張功父寺丞書〉，《楊萬里集箋校》，卷 68，頁 2877。

⁵⁴ [宋]楊萬里，〈黃御史集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79，頁 3209-3210。

⁵⁵ [宋]楊萬里，〈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79，頁 3216。

於仕，銳於追前輩而鈍於取世資。」⁵⁶ 這種為追求詩藝而甘願疏離功名，尚友詩壇前輩而不汲汲於富貴的表現，是所謂真正的詩人。

事實上，楊萬里的詩友並非都是窮寒之士，也有像范成大（1126-1193）、張鎡（1153-1221）這樣的達官貴宦，從與他們的交往文字中，提供另一角度來認識楊萬里的論述。張鎡，字功父，南渡名臣張俊（1086-1154）之孫，家世顯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⁵⁷ 但在詩歌創作上，張鎡卻是楊萬里極為看重的後起之秀。淳熙十三年（1186），為張鎡詩集所作之序這麼說：

句裏勤分似，燈前得細嘗。孤芳後山種，一瓣放翁香。

苦處霜爭澀，臞來鶴校強。不應窮活計，公子也忙忙。⁵⁸

詩中稱讚張鎡勤奮寫詩，作品遠紹陳師道的精神，同時也學習到陸游的精髓。頸聯再以「苦」、「臞」描述其苦吟詩風，可知張鎡對詩藝追求的苦心孤詣。最後則假藉不解的口氣來讚嘆，作詩，本來是窮苦詩人的活計，像張鎡這種貴公子怎麼樂此不疲呢？把苦心作詩視為「窮活計」，也就是與功名富貴無關的活動。陳師道、陸游分別是楊萬里深所推崇的前輩與同輩詩人，一是北宋詩人以生命實踐回應詩窮論述的典範，⁵⁹ 一是楊萬里曾以「少陵生在窮如蝨，千載詩人拜蹇驢」之語期許的詩人。三年之後，淳熙十六年（1189），楊萬里再為張鎡寫〈約齋南湖集序〉：「若夫面有敲推之容，而吻秋蟲之聲，與陰何、郊、

⁵⁶ 〔宋〕楊萬里，〈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79，頁 3216。

⁵⁷ 〔宋〕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20，頁 374。

⁵⁸ 〔宋〕楊萬里，〈跋張功父通判直閣所惠約齋詩乙稿〉，《楊萬里集箋校》，卷 21，頁 1076-1077。

⁵⁹ 陸游之窮，可從楊萬里的唱和詩中看出。陳師道之窮，可參見李妮庭，〈陳師道的詩人意識與「詩窮」表述〉，頁 169-213。

島先登，優入於饑凍窮愁之域，此我輩寒士事也。」⁶⁰ 語似調侃張鎡以貴顯之姿作寒士詩人之事，其實卻是讚許其能全身心投入詩歌創作。在另一首和詩中，楊萬里也稱讚其創作是：「約齋太瘦古仙真，寄我詩篇字字新。受業陳三能幾日？無端參換謫仙人。」⁶¹ 張鎡為作詩而變瘦，而詩歌卻愈發新奇，效法的對象也從陳師道轉到李白。楊萬里以窮詩人典範讚許張鎡，為其畫像作贊時，更將其形容為「冰茹雪食」、「瑀碎月魄」的「窮詩客」。⁶² 可見，不為常人所喜的「窮」，卻成為詩人之所以是詩人的獨特標誌，並進一步內化成詩人這一身分特有的精神象徵。

此一論調在稍後為范成大所作的序中，有更清楚詳細的表述。序寫於紹熙五年（1194），序中先頌美范成大在政事上的不凡表現，接著評論其文學成就：

若夫劇心於山林風月之場，雕龍於言語文章之園，此我輩羈窮酸寒無聊不平之音也，公何必能此哉？古語曰：「爭名者必於朝，爭利者必於市。」是二人者，使之以此易彼，二人者其肯乎哉？非不肯也，不願也，非不願也，亦各樂其樂也。詩人文士，挾其所樂，足以敵王公大人之所樂也。不啻也，猶將愈之。故王公大人，無以傲夫士，而士亦無所折於王公大人。今日乃自屏其所可樂，而復力爭夫士之所甚樂，所謂「不虞君之涉吾地」者，其不多取乎？⁶³

楊萬里文中已自稱「環堵荒寒之士」，因此，「我輩」一詞，突顯自己與范成大身分的差異，也表明自己是站在窮詩人的立場發言。楊萬里

⁶⁰ 〔宋〕楊萬里，〈約齋南湖集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80，頁 3251。

⁶¹ 〔宋〕楊萬里，〈和張寺丞功父八絕句〉之一，《楊萬里集箋校》，卷 40，頁 2124。

⁶² 〔宋〕楊萬里，〈張功父畫像贊〉，《楊萬里集箋校》，卷 97，頁 3740-3741。

⁶³ 〔宋〕楊萬里，〈石湖先生大資參政范公文集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82，頁 3296。

以「爭名」、「爭利」者與「詩人文士」作對比，但是，真正的詩人並不會羨慕王公大人的榮華富貴，原因是「各樂其樂」。詩人與王公大人在經濟、政治上固然相差甚遠，窮達異途，但楊萬里認為「詩人」在詩歌創作時所獲得的精神資產與愉悅，並不遜於王公貴人。這種精神上的優越感，等於是彰顯詩人在公共領域的地位，也肯認了詩人之窮是其獨特的身分標誌。

從〈約齋南湖集序〉、〈石湖先生大資參政范公文集序〉兩文來看，楊萬里並未大談「詩能窮人」或「窮而後工」，而是強調窮乃詩人之精神特質的看法。在說明張鑑、范成大身分顯貴，生活條件優渥的同時，更讚許其心靈精神上卻以窮詩人作為趨向。本來，「詩人」有其相應的現實遭遇與生活條件，如「飢凍窮愁」、「羈窮酸寒」等，這是有別於王公貴人的標誌。然而，楊萬里並未陷於傳統的論調中，認為詩使人窮或者窮而愈工，反而強調詩人之窮，所謂「我輩事」、「詩人所樂」，不僅不是可悲哀歎的，而且是一種積極的承擔與自由的選擇。這種觀點，成為楊萬里論詩人之窮的重要觀點。

楊萬里不僅把「窮」視為「詩人」必須面對且坦然接受的狀況，也常以「窮」勉勵同好，表現自我：「我自窮愁坐綴文，何堪見子可憐生？兩窮政好同詩社，一戰猶須倩酒兵。」⁶⁴「老窮只是詩自悞，春色撩人又成句。」⁶⁵ 詩中直接用「窮」、「老窮」描述自我，並把「窮」與無法忘情作詩的自我形象聯繫在一起。與陸游的和詩中，更明顯呈現出這樣的態度：

今代老龜蒙，無書遺子公。也能將好句，特地寄西風。

遲暮甘三已，飄零笑兩窮。絕憐張與陸，百戰角新功。

別去公懷我，詩來我夢公。半輪笠澤月，一信鏡湖風。

⁶⁴ 〔宋〕楊萬里，〈和張器先十絕〉之四，《楊萬里集箋校》，卷5，頁281。

⁶⁵ 〔宋〕楊萬里，〈長句寄周舍人子充〉，《楊萬里集箋校》，卷6，頁314。

豈有詩名世，而無鬼作窮？管城言曉事，猶欲策元功。⁶⁶

這兩首詩寫於紹熙元年（1190），收入《江東集》中。詩例一用「兩窮」拉近自己與陸游的關係。詩例二則以「鬼作窮」說明以「詩名世」之後所帶來的必然命運。兩首詩的最後一聯，都表達出「不悔得詩窮」的態度。如果說同輩詩人論窮時多少帶有自嘲與狂放的話，那麼，對後輩詩人則表現出更多的以窮相許：

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
新拜南湖為上將，更推白石作先鋒。
可憐公等俱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
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移封。⁶⁷

張鎡、姜夔是楊萬里非常重視的兩位後輩詩人，在讚賞其作品時，也不忘提醒他們詩人多窮這一歷史事實。但以「癡絕」描述他們的創作個性，又隱含了讚許之意。

因此，當楊萬里為不遇而窮困的詩人作序時，往往強調詩人的窮困來自於他們的自由選擇，不應該為此感到惋惜悲慨，為同鄉好友施少才（?-?）所作的序中這麼說：

闕焉而不以覲，市焉而不以亟。施子之為人則然，詩文云乎哉！
則其窮也亦宜，吾蓋喜而悲之。施子而不窮，施子當不喜而窮也，吾又奚以悲？吾不以悲夫施子之窮，而以悲夫窮施子者也。斯人也，有斯文也。有斯詩也，而有斯窮也。非夫窮施子者之為悲，而誰為吾以悲之？⁶⁸

⁶⁶ [宋]楊萬里，〈和陸務觀用張季長吏部韵寄季長兼簡老夫補外之行二首〉，《楊萬里集箋校》，卷31，頁1577-1578。

⁶⁷ [宋]楊萬里，〈進退格，寄張功父、姜堯章〉，《楊萬里集箋校》，卷41，頁2190。

⁶⁸ [宋]楊萬里，〈施少才蓬戶甲稿後序〉，《楊萬里集箋校》，卷77，頁3165-3166。

讚嘆施少才不汲汲營營，深自韜隱，最終導致窮困其身。這既然出自於施少才的自由選擇，楊萬里認為不應為他抱不平。因為施少才自覺承擔「窮」的遭遇，自身並未感到悲愁，既然如此，豈容外人費心擔憂。為王正夫（?-?）所作的〈三近齋餘錄序〉中，楊萬里藉孟浩然（689-740）、賈島二位唐代詩人，進一步闡明此一論點。文中回憶起早年與尤袤（1127-1194）東宮講讀時，一日看見光宗几案上竟有孟浩然、賈島詩集。兩人相對感歎曰：

二子之詩一也，不見知於當時，而見知於今日，何也？可以弔二子之生前，而賀之於身後矣。然二子之可弔，又未若當時之可弔也。有此士而失之，獨不可弔乎？⁶⁹

作為詩家能手，楊萬里不解孟、賈二人為何無法「見知於當時，而見知於今日。」感歎他們生前的不遇窮困時，又為二人身後所得的詩名感到欣慰。雖然孟、賈二人的遭遇令後人感到惋惜，但楊萬里更為無法接受他們的時代感到悲哀。在此，楊萬里已不是感嘆個人之窮，而是造成個人之窮的時代。接著，楊萬里提出一個疑問：「二子亦過矣，深自匿而不求知，非過歟？」⁷⁰ 也就是說，孟、賈二人的困頓遭遇，不能只歸咎於當時的社會與政治，他們的韜光晦跡，也是導致其不遇的原因。從這個疑問出發，楊萬里進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

嗟乎，是二子之過也，抑二子之願也。天下莫自賤於求知之士，而不求知者為可貴。彼其不知知也，其所挾者必至珍也。所挾愈珍，則其自匿愈深，二子之不知知，豈終無知我者乎？今日几案之上是已。特知之者有遠近，有遲速耳。不見知於近，必見知於遠。病不遠耳，遠非所病也。惟愈遠則愈貴耳，遲速足

⁶⁹ 〔宋〕楊萬里，〈三近齋餘錄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83，頁 3347-3348。

⁷⁰ 〔宋〕楊萬里，〈三近齋餘錄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83，頁 3348。

較哉？故曰：是二子之過也，抑二子之願也。⁷¹

表面上是責備二子不求自我表現，但也在讚許二人獨立自由的人格。孟浩然、賈島窮困不遇，固然可歸咎於他們疏離、漠然的處世態度，但也何嘗不是他們的自由選擇與主觀願望。因為「不求知者」無所求於當世，所以他們可以獨立不倚地面對富貴通達。如此，即使無法見知於當時，卻能傳之後世，千古不朽。因此，楊萬里最後以「是二子之過也，抑二子之願也」總結，一反前人對孟浩然、賈島的評價。⁷² 以「二子之願」強調詩人之窮固然有時代的因素，但何嘗不是個人自由獨立的選擇。王正夫死後，士大夫爭傳其詩文，「傳與不傳，見與不見，正夫何憾焉？」由此可知，楊萬里的最終結論是，既不因「傳」、「見」而喜，也不因「不傳」、「不見」而悲，歷史自然會作出評斷。

施少才、王正夫不求聞達，甘於承受窮之遭遇，楊萬里隱有讚許之意。從這種態度中，可看出楊萬里重視詩人主體精神的自由，甚至對後世不朽的詩名也抱持著超然的態度。但楊萬里並未停留於這一層面，而是進而尋求更深刻的道德依據。〈見何德獻提舉書〉一文中自述：

某也不佞，區區所嚮，偶有前所稱之病。坐是落落而窮也，窮而不終窮，或者有俟於古之君子歟？不遇於今之君子者，命也；遇於古之君子者，道也。惟命能勝道，惟道亦能成命。言道不言命，不在閣下乎？⁷³

⁷¹ [宋] 楊萬里，〈三近齋餘錄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83，頁 3348。

⁷² [五代] 王定保《唐摭言》中，有「無官受黜」條，記載孟浩然、賈島因為詩得罪皇帝，導致終身不得仕與貶黜。詳見 [五代] 王定保撰，姜漢椿校注，《唐摭言校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年），卷 11，頁 223-224。這個傳說雖出自筆記，其不符史實處早有論斷，卻可視為唐人因詩致窮的觀念體現。

⁷³ [宋] 楊萬里，〈見何德獻提舉書〉，《楊萬里集箋校》，卷 67，頁 2762。

所謂「前所稱之病」，如書中所云「嗜古而與時之背，信己而不人之徇」，是「直情徑行，又不能隨巧進善游者之後」，這樣的病可稱為「天下之癡絕，而人之所共棄者也。」這樣的處世態度與個性，當然會帶來貧窮與不遇，但楊萬里卻宣稱「雖然不遇於今之君子，安知不遇於古之君子乎？」這裡透露出楊萬里尚友古人，心追古道的堅忍氣節。因此，「窮而不終窮」是因為「有俟於古之君子」。如果遇不到「今之君子」，這是命，是客觀條件的限制與侷限；而「遇於古之君子」，才是「道」，是不變的常理與正道。雖然現實遭遇無法強求，但是正道卻無所不在，也能改變命所帶來的限制。因此，楊萬里建議這位朋友能「言道不言命」。從命與道的角度探討處窮，顯示了楊萬里在道學修養的基礎上，突破了唐人以天命論窮的侷限。此一觀點於〈答施少才書中〉有更清楚深入的表述。施少才是楊萬里的同鄉，彼此有深厚的交情，自云「與施子布衣交，且均貧且賤焉。」⁷⁴ 在為施少才作詩集序時，楊萬里已說：「吾不以悲夫施子之窮，而以悲夫窮施子者也。斯人也，有斯文也。有斯詩也，而有斯窮也。非夫窮施子者之為悲，而誰為吾以悲之？」⁷⁵ 認為詩歌雖然為施少才帶來窮困的遭遇，但是他並不悲嘆好友，反而哀憐這個埋沒人才的時代。比起情真意切的集序，〈答施少才書〉這篇書信論析更為透澈，更能見出楊萬里論窮的理論依據：

且命也者，既能通塞，吾於今亦足矣。又能通塞吾於後，不已甚乎？使其果能若是，則孔、孟、顏、曾，久哉其泯也。揚雄、韓愈，命能不伸其生，而不能不伸其死。二子之死，其言之巨，力猶足以不制於命，而况孔、孟、顏、曾也哉！⁷⁶

⁷⁴ 〔宋〕楊萬里，〈答周子充內翰書〉，《楊萬里集箋校》，卷 65，頁 2796。

⁷⁵ 〔宋〕楊萬里，〈施少才蓬戶甲稿後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77，頁 3165-3166。

⁷⁶ 〔宋〕楊萬里，〈答施少才書〉，《楊萬里集箋校》，卷 65，頁 2800。

既然現實際遇的窮通是「命」，是繫於今人的賞遇與否，那麼不妨抱持豁達的態度。然而，現實的窮困阻厄只是一時的，並不會影響到身後。楊萬里舉孔子（551-479 B.C.）、孟子（372-289 B.C.）等先秦儒者為例，他們在當時窮愁潦倒，未曾通達，在後世卻成為不朽聖賢。即使是揚雄（53 B.C.-18 A.D.）、韓愈，他們生時不如意，但所流傳的文章著作，卻讓他們成為儒家傳統的賢人，生生世世不朽。這些古聖先賢都以「道」超越了「命」的限制。因此，楊萬里說「所謂命者，論而勿議可也，存而勿論亦可也。」面對人無法控制的「命」，楊萬里既不是宿命論，也沒有強調與之對抗，而是提出「論而勿議」、「存而勿論」的觀點。此一理性態度的內涵在於：「道」比「命」具有更高的價值指導原則。楊萬里舉揚雄、韓愈為例，揚、韓二人生前雖然不得其志，不能充分實現自己的志向，但死後卻能沾溉後學，發揚儒道。也就是說，生前雖然受到「命」的限制，但「道」卻是貫通萬古，超越個人的生死通塞，因此死後仍能傳於後。楊萬里與施少才所談的問題是能否傳於後的問題，施少才顯然是站在信「命」的一方，而楊萬里卻指出從「道」的重點。所以，對於著作文章是否傳於後這個問題，楊萬里總結而言：「傳於後而不行於今，吾奚病哉！既傳於後，又欲行於今，不既傷廉矣乎？以是而求於彼，彼亦必告匱矣。」⁷⁷認為如果能傳於後的話，即使不行於今，自己也能坦然接受。因為一旦抱持既想行於今，又欲傳於後，就容易有得失之心，將導致更大的損失。

〈千巖摘稿序〉是楊萬里為蕭德藻詩集所作的序，蕭德藻字東夫，其詩集名為《千巖摘稿》。在寫給後輩詩人姜夔的詩中，楊萬里不僅將其與范成大、陸游、尤袤並列，所謂「尤、蕭、范、陸四詩翁」；

⁷⁷ [宋]楊萬里，〈答施少才書〉，《楊萬里集箋校》，卷65，頁2801。

又推許為「今日陳後山」，「道肥詩彌瘦」，⁷⁸ 可見他對蕭德藻其人其詩的推崇。文中先定義「貧」、「窮」、「災」、「疾」：

士飽乎學而不療腹之饑，肥乎德而不救妻子之瘠，茲謂貧，列禦寇、黔婁是也。才經天下而一身之不達，名垂後世而當時之不逢，茲謂窮，仲舒、馮衍是也。人孰無耦？己則鰥居；人孰無承？己則哭子，茲謂災，子夏、莊周是也。吾身之可樂也，非吾身之可樂也，身安之可樂也。一日不安，則是身者吾之憂也；豈惟吾之憂也，抑亦吾之仇，茲謂疾，冉伯牛、左丘明是也。⁷⁹

可知貧是自己與家人都必須面對饑餓；窮是有經邦濟世之能卻沒有機會，在後世有不朽名聲然而在生前卻失意不遇。災則是無子嗣，疾則是身體的病痛苦惱。這四者都屬於人生的不幸，遭遇任何一項都將使人難以承受，而蕭德藻竟然集四者於一身：

今使惡人之憎夫人也，憎之矣，不必窮之可也；窮之矣，不必貧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不必災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又災之矣，不必疾之亦可矣。有并舉其四不必者而集之於一身，借曰其人之惡，其忍憎夫人而屬之至此極乎？人且不忍也，天其忍乎？……東夫以蓋代之氣，經世之才，驚人之詩，窒其二，亨其一，安知夫天之不私東夫乎？專其私，尤其忍，東夫其忍乎？⁸⁰

按照前人觀點，只要遭遇貧、窮、災、疾之一，就可謂「窮」了，而蕭德藻卻集四者於一身，可謂「窮」的極致。與這四窮相比，蕭德藻

⁷⁸ [宋] 楊萬里，〈賦永豐宰黃巖老投贈五言古句〉，《楊萬里集箋校》，卷 36，頁 1853。

⁷⁹ [宋] 楊萬里，〈千巖摘稿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81，頁 3279。

⁸⁰ [宋] 楊萬里，〈千巖摘稿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81，頁 3279-3280。

也同時具備「蓋代之氣」、「經世之才」與「驚人之詩」，雖然前二者無從發揮，然則能創作出「驚人之詩」，已經足以彌補上述的四窮與二室。當蕭德藻請楊萬里為其作序時，表現出「若未嘗窮且貧且灾疾者」，楊萬里深深感到慚愧，認為：「東夫甚樂而不憂，余淺之為丈夫也！余何足以知東夫哉？」⁸¹「樂而不憂」，彰顯出蕭德藻身處窮厄，卻泰然處之，安之若素的道德修養。這樣的精神正好呼應楊萬里〈石湖先生大資參政范公文集後序〉所說的：「詩人文士，挾其所樂，足以敵王公大人之所樂也。不畜也，猶將愈之。」把詩人所樂，凌駕於王公大人之所樂。當然，楊萬里所謂的詩人之樂，非從物質享受與功名富貴而來，而是從純粹的詩歌創作過程中產生。

四、抵抗政治的詩學精神

前文所論「饑寒」，主要是從生存條件的狀態而言，詩人不僅坦然接受饑餓寒冷，甚至以此彰顯作為詩人的精神特質。而從楊萬里周遭詩友的際遇來看，以窮困不遇者居多，而從政治仕宦的角度定義「詩窮」，也是早已存在的說法，如南宋魏慶之（?-?）《詩人玉屑》載「坐詩窮」：

孟浩然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唐玄宗聞之曰：「卿自棄朕，朕何棄卿？」孟貫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窮，所謂轉喉觸諱。⁸²

舉孟浩然、孟貫（?-?）二人為例，他們以詩得罪君主，導致仕宦之路的不順，最後以「坐詩窮」作結。說明，「詩窮」的產生是因為

⁸¹ [宋]楊萬里，〈千巖摘稿序〉，《楊萬里集箋校》，卷81，頁3281。

⁸² [宋]魏慶之著，王仲聞點校，《詩人玉屑》（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15，頁462。

在政治上得罪當權者，因而遭遇窮困。楊萬里並未忽略此一角度，如〈千巖摘稿序〉就把「窮」定義為「才經天下而一身之不達，名垂後世而當時之不達。」這種觀點主要是從詩人仕宦理想之落空的角度著眼。但在楊萬里的時代，政治之窮遠比懷才不遇更為複雜，陸游〈澹齋居士詩序〉可作參證：

蓋人之情，悲憤積于中而無言，始發為詩。不然，無詩矣。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己，故其詩為百代法。國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堯臣、石延年棄不用，蘇舜欽、黃庭堅以廢絀死。近時，江西名家者，例以黨籍禁錮，乃有才名。蓋詩之興本如是。紹興間，秦丞相檜用事，動以語言罪士大夫，士氣抑而不伸，大抵竊寓于詩，亦多不免。⁸³

北宋之前的詩人多出於「不能自己」的「悲憤」而產生足為「百代法」的作品。而宋代詩人，不是「棄不用」，就是「廢絀」，元祐黨禁以來的詩人，則多被「黨籍禁錮」。可知，北宋以來的詩人之窮，多來自於特定的政治環境。南渡之後，秦檜（1091-1155）弄權專政，動輒以言論陷罪士大夫，嚴重打擊士氣。在此肅殺的政治氛圍中，即使是詩的創作，也常常被羅織罪名。陸游的敘述，說明南宋士大夫仍然籠罩於政治打擊的氣壓中。在黨禁、詩禍頻繁的局勢中，如何看待由政治造成的詩人之窮，也就成為當時無可迴避的問題。

不論是為窮困詩人還是顯貴詩人，楊萬里都強調詩人之窮是一種自覺的承擔與選擇，由此突顯詩人身分的獨立性與優越性。而楊萬里為歐陽伯威（?-?）與林景思（?-?）所寫的序中，更直接表達了政治領域的富貴權勢是一時的，詩歌創作的成就與不朽具有更高的價

⁸³ [宋]陸游，〈澹齋居士詩序〉，《全宋文》，卷4934，頁350。

值。這兩位朋友在現實生活中都非常貧窮困頓，〈歐陽伯威脞辭集序〉中，楊萬里記述早年遇見歐陽伯威時，意氣風發，詩思敏捷，深為嘆服。二十年後，聞鄉人蕭岳英（？-？）得異人以教子弟，前往謁見，正是這位昔日自己敬重的歐陽伯威：

方吾二人相識時，皆年少氣銳，豈信天下有老哉？予既涉患難，鬢髮之白者十二，而風霜凋剝之餘，落然無復故吾矣。伯威之氣，凜凜焉不減於昔，獨其貧增焉耳。不以增於貧而減於氣，如伯威者鮮乎哉？予因索其詩文，伯威輦且太息曰：「子猶問此耶？是物也，昔人以窮，而吾不信，吾既信，而窮已不去矣。子猶問此耶？」已而出《脞辭》一編曰：「子不憐其窮而索其詩，子盍觀其詩而療其窮乎？」⁸⁴

歲月催人老，二十年後的自己與歐陽伯威，已無「年少氣銳」之態，其英銳之氣雖然不減昔日，貧窮困頓卻有增無減。然而，楊萬里的讚歎似乎也引起歐陽伯威的牢騷。因此當楊萬里索其詩文觀覽時，歐陽伯威表達了自己因詩文而窮的感慨。從語句中，可看出歐陽伯威深深認同詩能窮人之說，並希望得到楊萬里對這個論題的看法。楊萬里的回答是：

予退而觀之，其得句往往出象外而其力不遺餘者也。高者清厲秀邃，其下者猶足以供耳目之笙磬卉木也。蓋自杜少陵至江西諸老之門戶，窺闖殆遍矣。他日伯威過我曰：「子真不有以療我之窮耶？」吾笑謂之曰：「窮之療與否，可療與否，吾且不吾及，吾庸子及哉？吾有一說焉：杜子美、李林甫、謝無逸、蔡太師四人者，子以為孰賢？」伯威怒曰：「子則戲論也。然人物當如是論之也哉？」予曰：「人物何不當如是論也？當李

⁸⁴ [宋]楊萬里，〈歐陽伯威脞辭集序〉，《楊萬里集箋校》，卷77，頁3173。

與蔡之盛時，天下肯以易杜與謝哉？今乃不然耳。然則子之窮，姑勿療焉可也。雖然窮之瘳如李焉，如蔡焉，不既震曜矣哉？杜與謝之窮，至今未瘳也。子之窮，療焉亦可也。杜與謝之窮，則至今未瘳矣。使二子而存，肯以此而易彼乎？子之窮勿療焉亦可也。」伯威曰：「吾當思之。」乃書其說以序其詩。⁸⁵

當歐陽伯威論及自己的窮與文學事業之間的關係時，是充滿疑惑與不解，而楊萬里這段文字，就是對歐陽伯威「觀其詩而療其窮」的回應。楊萬里先把歐陽伯威的詩歌成就比作杜甫、江西詩派的傳人，大有讚許欽佩之意。接著以杜甫與謝逸（1068-1112）作為論說「詩之窮可療否」的依據。唐玄宗在位時期，李林甫（683-753）把持朝政，營造「野無遺賢」的假象，間接促成像杜甫、元結（723-772）這類有志之士無法進入朝廷。謝逸，字無逸，不僅是理學家，也是臨川詩人的代表、在江西詩派的後學中有崇高的地位。⁸⁶此外，謝逸更以安貧樂道的形象著稱於時，劉克莊（1187-1269）將其與「自鬻其技至貴顯」的韓駒（1080-1135）對比，讚許其「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⁸⁷說明，謝逸作為詩人，其德性節操也深受肯定。大觀元年（1107）蔡京（1047-1126）權勢大盛時期，朝廷設「八行」科取士，撫州太守朱彥（?-?）薦舉謝逸，謝逸不得已上朝。一宿之後，棄官歸鄉里。謝逸之舉代表南宋詩人超然於朝廷政權，以隱遁鄉里、專注於詩作為抵抗的姿態。文中所列出的兩組人物，李林甫、蔡京代表掌握政治權力的人物；杜甫、謝逸兩人，不論是非自願或自願，是遠處政治權力核心之外的代表，因此也都注定要承受貧窮與不遇。楊萬里明知

⁸⁵ [宋] 楊萬里，〈歐陽伯威脞辭集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77，頁 3173-3174。

⁸⁶ 伍曉蔓，〈臨川四友〉，《江西宗派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5 年），頁 271。

⁸⁷ [宋] 劉克莊，〈江西詩派總序·二謝〉，《劉克莊集箋校》，卷 95，頁 4026。

故問，以「四子孰賢」讓歐陽伯威進入自己的闡述脈絡。李林甫、蔡京在當時排除異己，權傾一世，然人亡政息，湮滅無存；而杜甫、謝逸二人在世時雖然窮困潦倒，死後卻憑藉詩作，萬世流芳，天下重之。楊萬里進而用設問的方式闡明，雖然生活窮困不安，但是杜甫、謝逸也不會用後世的詩名來換取當日的榮華富貴。楊萬里「子之窮勿療焉亦可也」一語，道出「窮」是詩人之所以是詩人不可或缺的條件。在此，可以看出，楊萬里如此敬佩歐陽伯威的詩，除了藝術成就之外，更敬慕其發自內在的道德氣節與處窮風範。〈跋歐陽伯威詩句選〉就說：「急取此軸，快讀一過以咽之，蕭然不知此在塵埃間也。」⁸⁸「不知此在塵埃間也」一語，道出歐陽伯威現實生活雖然飽受饑寒窮困，精神上卻超然世俗，餘裕自如。

〈歐陽伯威脞辭集序〉是用政治權勢的短暫彰顯詩人之窮的積極性、主體性以及不朽。以此肯定「詩人之窮」的意義與價值。在權勢與富貴的前面，詩人寧願選擇詩人這條道路。在〈雪巢小集序〉中，楊萬里再重申此論。當時著名詩人林景思（?-?），以「雪巢」名居室，詩集則稱《雪巢小集》。林景思為一介寒士，以詩知名於當時，與范成大、尤袤、樓鑰（1137-1213）均有詩文往來。楊萬里文章一開始，先敘述林景思詩的高拔清邁，有超越唐人的氣象與成就，若李白在世，也當驚賞其作品。接著引用尤袤對林景思之窮的解釋與疑惑：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之論也。然至如「桃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花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遐不可追，其卓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惜其窮，至謂「豈發造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

⁸⁸ [宋]楊萬里，〈跋歐陽伯威詩句選〉，《楊萬里集箋校》，卷98，頁3758。

貴者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既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者。」⁸⁹

林景思的詩既然寫得如此高妙超拔，生活卻是如此困苦窮寒，尤袤為此嘆息。接著，楊萬里詳細列出尤袤解釋林景思之窮的數種說法。「發造化之祕而天惡此」說，可以陸龜蒙（?-881）為代表。⁹⁰ 接下來「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可得」，認為有了高超的詩才，必得承受窮困的命運，這種說法也可從歐陽脩對梅堯臣的評論找到。⁹¹ 第三種說法立基於第二種說法上，但強調「未易以理曉」，即有才者之厄運，無法用理智說明解釋。此說也可以追溯到白居易〈讀鄧魴詩〉「天不與爵壽，唯與好文詞。此理勿復道，巧曆不能推。」⁹² 可以看出，尤袤對「詩窮」的看法，雖然羅列出三種，但是多襲用舊說，並未提出新的解釋方向與不同的理論內涵。楊萬里順著尤袤的解釋，展開自己與林景思的對話：

予嘗摘此語以唁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祕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即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

⁸⁹ 〔宋〕楊萬里，〈雪巢小集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81，頁 3282-3283。

⁹⁰ 〔唐〕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後〉：「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臆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於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唐〕陸龜蒙撰，王立群、宋景昌點校，《甫里先生文集》（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 年），卷 18，頁 270。

⁹¹ 此說見梅堯臣〈依韻和永叔子履冬夕小齋聯句見寄〉一詩，詩後附註，「永叔嘗見嘲，謂自古詩人率多寒餓顛困：屈原行吟於澤畔，蘇武啗雪於海上，杜甫凍餒於耒陽，李白窮溺於宣城，孟郊、盧仝栖栖於道路。以子之才，必類數子。」〔宋〕梅堯臣撰，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卷 10，頁 171。

⁹² 〔唐〕白居易撰，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卷 10，頁 781。

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饑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雖欲如郊、島之饑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黃、秦乎？魯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為宰相，貴震天下。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黃、秦不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黃、秦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黃、秦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黃、秦，吾何幸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涯、餗、王、蔡同其達，而子為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為橫民，又欲不與詩人同受橫政，可乎？」⁹³

文中，楊萬里把〈歐陽伯威脞辭集序〉的論點更推進一步，選擇更極端對立的兩組人物，王涯（？-835）、賈餗（？-835）、孟郊、賈島分別代表因政治之禍亡身的能文宰相以及終其一生飽受窮寒困苦卻苦吟不輟的詩人；蔡京、王黼（1079-1126）、黃庭堅、秦觀（1049-1100）分別代表權傾一時，逐賢斥忠的權臣與身陷詩禍，貶死他鄉的著名詩人。在林景思看來，孟郊、賈島並不會羨慕王涯、賈餗的富貴得勢，相反，孟郊、賈島反而同情王涯、賈餗因為富貴權勢而引來的殺身之禍；而黃庭堅、秦觀也不願意得到如蔡京、王黼的顯赫權力，因為蔡

⁹³ [宋]楊萬里，〈雪巢小集序〉，《楊萬里集箋校》，卷81，頁3283-3284。

京、王黼的富貴為他們帶來了千古罵名。因此，雖然林景思的窮困甚於孟郊、賈島、黃庭堅、秦觀，但他卻非常自豪而驕傲地與這些詩人同樣處於這種貧賤饑寒的處境中。這種鄙棄富貴，甘願處窮的態度，林景思用了一個相當獨特的詞彙，即「天之橫民」。「橫民」一詞，出自《孟子·萬章下》：「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⁹⁴ 這段文字本是孟子描述「聖之清者」的伯夷（?-?），不入暴政橫行的危邦，不居充斥目無法紀之民眾的地方。林景思把詩人比作政治上缺少教化的橫民，因為詩人不服從世俗社會的法度。雖然「天」仍具有統治主宰的能力，但是「橫民」卻無視於世間規範法則的權力。這樣的「橫民」就是詩人。這裡，楊萬里藉林景思之論，再次強調詩人處窮釋窮的自由意志。林景思並未從苦吟的角度評價孟郊、賈島，反而彰顯其獻身詩藝，不怨窮寒的執著；黃庭堅、秦觀是元祐詩人的代表，與蘇軾的師友之情導致他們的貶黜，但他們從未向當權者低頭屈服。針對林景思的回答，楊萬里帶出最後的結論：

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為君惜，延之為過也。余舉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心欲專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為余問之？⁹⁵

分別以「無遺力」、「無懼心」、「無怨言」彰顯出林景思面對窮困的堅定態度與高尚道德。再以「不顧」、「不悔」、「不辭」描述林景思專享「詩人」之窮的傲岸精神。樓鑰（1137-1213），繼尤、楊二人之後，再為林景思詩集作序，序云：「行誼高潔駢麟，不與世合。環堵蕭瑟，忍窮如鐵石，一郡人士稱重之。讀其詩，恍然自失，愈叩愈無窮。身

⁹⁴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20，頁669。

⁹⁵ [宋]楊萬里，〈雪巢小集序〉，《楊萬里集箋校》，卷81，頁3284。

雖未達，而以詩聞于諸公間。」⁹⁶ 肯定林景思的道德節操與孤高個性，也強調其「忍窮如鐵石」的固窮表現。

綜觀以上兩文，可看出以下三個論點，第一，〈歐陽伯威脞辭集序〉約寫於孝宗乾道八年（1172）間，而〈雪巢小集序〉則作於宋孝宗紹熙二年（1191）間，在〈歐陽伯威脞辭集序〉一文中，楊萬里明確表明「吾有一說」，此說舉杜子美、李林甫、謝無逸、蔡太師作對比，即兩位唐、宋著名窮詩人與當時的權臣，以此證成詩人之窮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故不必對窮之遭遇耿耿於懷。而〈雪巢小集序〉藉林景思之口，舉王涯、賈餗、孟郊、賈島四人為例，即分別死於甘露之變的丞相以及窮寒苦吟的詩人。這種論說方式與思維，明顯脫胎於〈歐陽伯威脞辭集序〉，只不過楊萬里藉林景思之口道出而已。第二，兩文中，政治上的顯赫成功是一時的，或將帶來殺身之禍；而詩歌創作上的成就，卻是不朽的。第三，兩篇文章都把「詩窮」的解釋權交給當事者，但都在最後點出，歐陽伯威、林景思寧願選擇窮詩人，也不願意成為顯貴權臣。

〈雪巢小集序〉中詩人與權宦的對比，寄寓著楊萬里對南宋黨禁的反思。徽宗崇寧年間，與蔡京為中心的新黨，不僅對舊黨人士展開大規模的定罪除名，並且嚴厲壓制蘇軾、黃庭堅的影響力，刻「元祐黨籍碑」、「元祐姦黨碑」以澈底禁止蘇、黃文字的流傳，號稱「崇寧黨禁」。⁹⁷〈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記〉云：

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毗某氏館之，太守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於戍樓，蓋圍之也。卒於所館，蓋饑之寒之也。先生之貶，得罪於時宰

⁹⁶ 〔宋〕樓鑰撰，顧大朋點校，〈雪巢詩集序〉，《樓鑰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49，頁925-926。

⁹⁷ 〔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徽宗本紀》（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19，頁365-369。

也，亦得罪於太守乎？鹿之肉，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先生之所挾，足以授小人之資也哉？夫豈不得罪於太守也！先生得罪於太守，則太守不得罪於時宰矣。豈為不得罪也，又將取榮焉。由今視之，其取榮於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饑寒窮死之地，今乃為騷人文士伛瞻鑽仰之場。來者思，去者懷，而所謂太守者，猶有臭焉！今君子之於小人，患不得罪耳，得罪奚患哉？⁹⁸

黃庭堅是崇寧黨禁之下的受害者，在宜州不僅飽受饑寒窮苦，最後死於貶所。楊萬里表面批判揣摩「時宰」之用意的「太守」，然而對「太守」的批判也隱含著對「時宰」的譏刺。這位太守由於想討好時宰，因此治罪任何在當時幫助黃庭堅的人士，這樣才能得到更多的榮華富貴。在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中，宜州確實成為黃庭堅的「饑寒窮死之地」。然而，時過境遷，太守之榮華已成罵名，黃庭堅的窮死之地卻成為騷人文士憑弔致敬的聖地。楊萬里在此突顯詩人之窮看似不幸，卻能成為不朽的根基。在〈杉溪集後序〉中，楊萬里記述了一位不懼文字之禍的劉才邵（1086-1157）。《杉溪集》是劉才邵的文集，周必大（1126-1204）先作序，故楊萬里稱此為後序：

是時，書肆畏罪，坡、谷二書，皆毀其印。獨一貴戚家刻印印之，率黃金斤易坡文十，蓋其禁愈急，其文愈貴也。今家有此書，人習此學，有知當時斯文之難得如此者乎？是小人之厄斯文，乃所以昌斯文也。然厄斯文者，今皆泯然與草木共腐。而斯文之傳，與日月爭光。然則斯文病不厄耳，厄奚病哉？古者聖賢君子之所守，於是可得而知矣。顧吾道是非何如耳！時之好惡，足為之動耶？六一、坡、谷，其知之矣。至於吾州之兩

⁹⁸ [宋]楊萬里，〈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記〉，《楊萬里集箋校》，卷72，頁3028。

先生，獨首犯時之大禁，力學衆人之所不敢學。所謂豪傑特立之士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⁹⁹

序中，楊萬里強調崇寧黨禁一事，蘇、黃詩被禁。楊萬里突顯政治勢力對詩人的強力打壓，然「厄斯文者」早已「與草木共腐」，而「斯文」卻「與日月爭光」，萬古不朽。楊萬里在此強調「聖賢君子之所守」，此即是「吾道」。蘇、黃詩的流傳與閱讀，之所以會愈禁卻流傳愈廣，因為此一行為本身是「抵抗勢力的象徵」。¹⁰⁰ 楊萬里在此所謂的「豪傑特立之士」，則是專就詩人的身分而言。

從蘇軾、黃庭堅的遭遇中，楊萬里感慨政治勢力對詩人的戕害與打擊，所謂「慶曆、元祐之間，忠臣義士，充盈朝野，非諸老之賢，祖宗之勤也，其積豈一朝一夕哉？自紹聖、崇、觀之大臣，指諸老為姦邪，挫摳銷泯，不盡不置也。」¹⁰¹ 歷史不一定會重演，但瘋狂的行徑卻往往以不同的形式出現。繼徽宗朝的蔡京後，南宋高宗朝的秦檜，仍扮演著以政治權力排斥異己的角色。楊萬里序文中，另外記載兩位不畏秦檜權勢而主動承擔道義責任的詩人，分別是胡銓（1102-1180）與王庭珪（1079-1171）。紹興八年（1138）十一月，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高宗，力陳對金作戰，並乞斬秦檜，以凝聚士氣。〈澹庵先生文集序〉記載此事：

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駕未返，不得已，將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虜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

⁹⁹ [宋]楊萬里，〈杉溪集後序〉，《楊萬里集箋校》，卷83，頁3352。

¹⁰⁰ [日]內山精也著，朱剛等譯，〈黃庭堅與王安石〉，《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508。

¹⁰¹ [宋]楊萬里，〈跋鄭威愍公事〉，《楊萬里集箋校》，卷99，頁3790。

自是胡馬不南者二十年。¹⁰²

表面上冷靜客觀敘述當時朝廷的和議政策，乃出自於高宗的孝心。但卻以金人敬重胡銓大義凜然，無懼個人生死的勇氣，反襯出高宗朝君臣的偷安怯懦。如此激烈的言論，勢必引起秦檜等人的憎恨，馬上遠謫嶺南新化。胡銓遭此貶謫，詩文創作「益加恢奇」：

其為詩，蓋自觝斥時宰，謫寘嶺海，愁猊酸骨，饑蛟血牙，風呻雨喟，濤譎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芥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¹⁰³

秦檜藉懲處主戰派，塑造由自己主導之和議的正當性，因此，其黨羽不遺餘力的貶斥異己，形成另一波政治肅殺氣氛。在當權者對胡銓痛之入骨，朝野士大夫一片沉默的局勢下，只有王庭珪寫詩為胡銓送行。楊萬里〈盧溪先生文集序〉就特別記載此事：

紹興八年，故資政殿學士胡公，以言事忤時相黜。又四年，謫嶺表。盧溪先生以詩送其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上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郎。時先生年七十矣。於是先生詩名，一日滿四海。里之士愛先生者，謂詩之禍，從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適以濟權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禍也，亦先生之過也。¹⁰⁴

王庭珪詩寫於紹興十二年（1142），是為胡銓遠貶海南時所作的送行詩。詩中高度稱許胡銓獨力扶傾的政治承擔，視為天下奇男子，襯顯出癡兒的尸位素餐。進而把「奸諛」與「忠義」對比，突顯胡銓的忠

¹⁰² [宋] 楊萬里，〈澹庵先生文集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82，頁 3318-3319。

¹⁰³ [宋] 楊萬里，〈澹庵先生文集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82，頁 3319。

¹⁰⁴ [宋] 楊萬里，〈盧溪先生文集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80，頁 3241-3242。

肝義膽，語氣強烈，正氣凜然，直言不諱。七年之後，秦檜讀到這首詩，仍大為不悅，開始構陷王庭珪，不僅遠貶王庭珪，並禍及其子，其目的在於鉗制反對紹興和議的聲音，鞏固自己的權力。雖然時人視為詩禍，但王庭珪卻不以為意，故楊萬里以「欣然犯之」形容。而王庭珪的詩名也開始為世人所知。胡銓、王庭珪都是挺身抵抗秦檜權勢，無懼災窮的代表詩人，因此成為楊萬里敬重的典範人物。楊萬里另有〈胡德輝蒼梧集序〉，記載「見惡於秦丞相，坐廢饑寒困窮以死」的胡德輝（?-?），¹⁰⁵ 彰顯其書、其文與德行之傑出。這類人物雖有困窮的政治際遇，但展現於詩、文中的人格力量，深為楊萬里所欽佩。

不論是為林景思、歐陽伯威，還是為劉才邵、胡銓、王庭珪，楊萬里都突顯這些人物不避詩窮、無懼詩禍的道德勇氣與承擔精神。楊萬里敬重這些人物，視為面對「詩窮」的典範詩人，其來有自。在〈杉溪集後序〉中，楊萬里自述自己十七歲時，曾問學於劉才邵，十年之後，又拜於王庭珪門下，劉、王兩人「其所以告予者，太學犯禁之說也。」¹⁰⁶ 說明，楊萬里青年時代，就從劉、王口中，耳聞這些勇於挑戰當權者，承擔道德節氣的詩人典範，此一學習經歷，正是其以詩抵抗政治之精神的淵源。

五、結論

從北宋徽宗朝的「崇寧黨禁」，經南宋高宗朝的秦檜專權，到寧宗朝的「慶元黨禁」，雖然性質不同，但都扮演著宋代士風與文風轉向的關鍵。這些事件對詩人創作所造成的衝擊，從政事、道學蔓延至

¹⁰⁵ 〔宋〕楊萬里，〈胡德輝蒼梧集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79，頁 3221。

¹⁰⁶ 〔宋〕楊萬里，〈杉溪集後序〉，《楊萬里集箋校》，卷 83，頁 3351。

文學，導致士人普遍憂讒畏譏，明哲保身；或者更關注個人道德修養，在安貧樂道之中創作詩文。但不管哪一種選擇，都「使該時期創作主體全面呈現出個體化、內省化的特徵」。¹⁰⁷ 陸游〈澹齋居士詩序〉所云：「（秦檜）動以語言罪士大夫，士氣抑而不伸，大抵竊寓于詩。」¹⁰⁸ 失去了直論時事的立場，只能以「士在江湖道更尊」自許，¹⁰⁹ 詩則轉而成為保全士大夫心志氣節的最後堡壘，也更積極地探索以詩彰顯詩人主體的可能性。這也就是為什麼兩宋文人對歐陽脩「窮而後工」一語都抱持高度的興趣。這樣的詩學發展，從積極面而言促成了中和詩學的完善，¹¹⁰ 卻也導致詩人成為離政治中心越來越遠的一類人物。正如稍後劉克莊的感慨：

本朝文治過唐遠甚，經義詞賦之士，悉尊寵用事，惟詩人遇合者少。內而公卿，外而強大諸侯，窮貴極富，致士滿門，類多抵掌談功名，飛筆作箋記者，未嘗容一詩人也。¹¹¹

既然朝廷不容，無緣於功名，詩人之窮就不只是政治上的挫折，也必須面對各種困境。此一文學環境，其實早在熙寧變法時期已揭開序幕，北宋後期的蘇轍、陳師道詩，已表現出重內在省察，鄙棄世俗功名的特色，但這種向內轉向的自覺觀照，進而形成書寫主題，於南宋中期之後達到最澈底的表現。從江西詩派後學到楊萬里、陸游，在詩、文作品中，清晰而具體地呈現出此一精神特質與創作傾向。而楊萬里的「詩窮論」，即提供了觀察此一詩學發展的角度。

以「愉情悅性」、「崇尚超越功利的審美態度」來認識楊萬里文學

¹⁰⁷ 沈松勤、姚紅，〈「崇寧黨禁」下的文學創作趨向〉，收入陶文鵬主編，《兩宋士大夫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頁146。

¹⁰⁸ 〔宋〕陸游，〈澹齋居士詩序〉，《全宋文》，卷4934，頁350。

¹⁰⁹ 〔宋〕陸游，〈春晚〉二首之二，《劍南詩稿校注》，卷66，頁3710。

¹¹⁰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118。

¹¹¹ 〔宋〕劉克莊，〈送謝忬〉，《劉克莊集箋校》，卷96，頁4072。

思想，顯然有所不足。¹¹² 從本文的論述就可知，終其一生，楊萬里不斷深化、擴大對「詩窮」的論述。「詩窮」論題發展至楊萬里，並未侷限於理論的探討，而是強調詩人的存在體驗與現實環境，因而，他不再糾纏於「詩」是否「能窮人」還是「能達人」，以及是否「窮而後工」的爭論。經歷過漫長的黨爭歷史與文字之禍，使南宋中期詩人得以站在更為客觀清醒的立場，對「詩窮」論題做出整理與發展。可以看出，楊萬里著重闡發「窮」對於道德主體與詩人身分所產生的意義，以及「窮」如何轉化成詩人的精神特質與資產，在饑寒生活與政治貶斥的困境中，仍能保持自適和樂的心靈狀態與精神境界。楊萬里「不悔得詩窮」的宣示，並非僅是放言高論，而有出自於對「不樂之後」、「未樂之初」的創作本質思考。而關乎溫飽的「饑寒」，即成為詩人面對貧困窮苦的第一關。楊萬里對此益常重視，並以此自負由「饑寒」所得的力量。在其論述中，並不否認「詩人例寒餓」，反而強調「詩人只言點，犯之取饑寒」，有主動「犯之」的不懼精神，才能在詩壇占有一席之地。可知，楊萬里把「饑寒」視為擁有詩人身分的基本特質。此一觀點，在與交往詩友的文字中，不斷加以強調。不論是與貴宦詩人范成大、張鎡的來往，或是與窮苦詩人施少才、陸游、蕭德藻的交遊，楊萬里一方面強調「詩人」注定與饑寒窮困相伴，一方面又彰顯「樂而不憂」、「窮而不悔」的自由精神。因此，詩人之樂可以敵王公大人之樂，寒餓詩人可與王公大人平起平坐。此一重視詩人個體內在超越性的傾向，在為歐陽伯威、林景思所寫的序中，則特別彰顯真正的詩人是以無悔無懼的精神，鄙視權臣奸相，在窮困潦倒中甘之如飴地創作。由此可知，楊萬里「詩窮」論的重點，並非只側重詩人以內在德性超越經濟與政治之窮，更有以詩反抗當權者、以「窮」彰顯詩人之存在尊嚴的文化意義。

¹¹² 郭艷華，《楊萬里文學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頁380。

楊萬里能對詩人處窮之道產生超越性思考與躬身實踐，既來自於其理學修養，更有其師學、家學淵源。可以說，楊萬里從「詩窮論」的角度，真正把北宋後期以來「獨立個體的內在超越」這一命題，加以行動實踐與理論表述。南宋末方岳（1199-1262），曾寫下一首夢見楊萬里與陸游的作品，詩題為〈夢放翁為予作貧樂齋扁，誠齋許畫齋壁，予本無齋，亦不省誠齋之能畫也〉。¹¹³ 真實生活中，方岳並無「貧樂齋」，以「貧樂」為齋名，正深刻反映出其所嚮往的精神境界。更值得注意的是，「却喜坐詩窮」的陸游作齋扁，¹¹⁴「不悔得詩窮」的楊萬里畫壁，方岳之所以「夢中親見兩詩人」，其實也就是期許自己能像陸、楊一樣，在安貧樂道中成為詩歌大家。從此也可看出，在方岳的認知中，陸、楊二人就是處窮安貧的詩人典範。這種無懼「詩窮」，在窮之中淬鍊心性修養、砥礪道德節義，進而直面窮困貧寒，孜孜不悔於詩歌創作的精神特質，成為南宋中後期詩人心嚮往之的境界。明乎此，就不難理解南宋末期詩人，即使承認「窮」是無法擺脫的命運，但更強調如何從「窮」之中蛻變成為真正的詩人，寫出優秀的詩篇。與楊萬里有詩來往的趙蕃（1143-1229）有詩句云「詩窮如是僅得名，欲作詩人寧易語」，就深刻體現這種精神追求。¹¹⁵ 類似的表述還有「但得作詩窮有味，曷憂從宦久無成」；「既將取詩名，先應歷詩窮」；¹¹⁶ 以及方岳「酒能作崇可忘酒，詩不窮人未是詩」；¹¹⁷ 莫不把「窮」視為實踐詩歌創作的必要條件，發展出昂揚而堅韌的人格特質。「詩窮」

¹¹³ [宋]方岳撰，秦效成校注，祖保泉、何慶善審定，《秋崖詩詞校注》（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卷5，頁76。

¹¹⁴ [宋]陸游，〈甲子歲元日〉，《劍南詩稿校注》，卷56，頁3276。

¹¹⁵ [宋]趙蕃，〈叔文再用韻賦詩亦復用韻答叔文兼呈伯玉昆仲〉，《全宋詩》，卷2623，頁30524。

¹¹⁶ [宋]趙蕃，〈夜坐讀書有感示兒曹〉，《全宋詩》，卷2629，頁30672；〈枕傍有杜集看其行役諸詩有感復書〉，《全宋詩》，卷2638，頁30842。

¹¹⁷ [宋]方岳，〈梅邊〉，卷17，頁274。

論題，從唐人的畏窮、避窮，到北宋的爭論未定，再到南宋的自覺承擔，此一詩學精神的形成、定型，楊萬里的論述與實踐，無疑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責任校對：江曉輝）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周〕晏子著，陳濤譯注，《晏子春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周〕莊子著，〔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
- 〔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唐〕白居易撰，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唐〕陸龜蒙撰，王立群、宋景昌點校，《甫里先生文集》，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 〔五代〕王定保撰，姜漢椿校注，《唐摭言校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
- 〔宋〕梅堯臣撰，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宋〕歐陽脩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宋〕蘇軾撰，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宋〕黃庭堅撰，劉尚榮校點，《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宋〕陳師道撰，任淵注，冒廣生補箋，冒懷辛整理，《後山詩注補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宋〕曾敏行著，朱杰人標校，《獨醒雜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6年。
- 〔宋〕陸游撰，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宋〕楊萬里，《誠齋易傳》，《文津閣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 〔宋〕楊萬里撰，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宋〕樓鑰撰，顧大朋點校，《樓鑰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 〔宋〕徐璣等撰，《永嘉四靈詩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 〔宋〕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宋〕羅大經撰，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宋〕方岳撰，秦效成校注，祖保泉、何慶善審定，《秋崖詩詞校注》，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
- 〔宋〕周密撰，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宋〕魏慶之著，王仲聞點校，《詩人玉屑》，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

二、近人論著

伍曉蔓，〈從居富到處窮：北宋尚富詩學淺論〉，周裕鍇主編，《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5月，頁449-465。

_____，《江西宗派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

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2003年。

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李妮庭，〈陳師道的詩人意識與「詩窮」表述〉，《東華漢學》第11期（2010年6月），頁169-213。

沈松勤、姚紅，〈「崇寧黨禁」下的文學創作趨向〉，陶文鵬主編，《兩宋士大夫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3月，頁128-147。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姜守誠，〈「送窮」考〉，《成大歷史學報》第四十號（2011年6月），頁175-234。

張健，〈「詩窮而後工」說之探究〉，《幼獅學誌》第15卷第1期（1978年6月），頁1-55。

_____，《文學批評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

梁庚堯，〈南宋的貧士與貧宦〉，《臺大歷史學報》第16期（1991年8月），頁91-137。

郭艷華，《楊萬里文學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劉子健著，趙冬梅譯，《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

鞏本棟，〈「詩窮而後工」的歷史考察〉，《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31期（2007年7月），頁121-144。

錢鍾書，《宋詩選註》，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

_____，《管錐篇》，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

〔日〕內山精也著，朱剛等譯，《傳媒與真相——蘇軾及其周圍士大夫的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Yang Wanli's Theory of *Shiqiong* and its Spirit of Poetics

Hsiao-Feng Chung*

Abstract

Shiqiong 詩窮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in Song dynasty classical poetry. It concerned questions of why poets were oftentimes poor, or why it was that poor poets tended to create better poetry. The latter half of this compound term, *qiong*, denoted not only a lack of material means but also setbacks in one's political career. Following Ouyang Xiu's 歐陽脩 claim that "poetry does not bring poverty to the poet, but enables one to become skilled in writing poetry," many poets expressed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this matter.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mpor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hiqiong*, this article focuses its discussion on Yang Wanli's 楊萬里 viewpoint. Yang Wanli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et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his theory of *shiqiong* was at once representative and influential. This article does not simply explain Yang Wanli's life of poverty, but rather seeks to shed light on his poetic identity and the value of his poetry. This analysis of Yang Wanli's oeuvre reveals that *qiong* had become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great poets.

Key words: Yang Wanli, *Shiqio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spirit of poetic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